

#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分析

## ——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

胡 莹

**【摘 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一般性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侧重于劳动的技术形式。他从劳动的独立性和社会依赖性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侧重于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从技术推动了分工和交换发展、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又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分析了劳动的技术形式对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塑造和限制,从而描绘出一幅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宏大画卷。从企业内部劳动过程来看,数字技术对企业劳动过程的介入使得劳动过程全面浸润在劳动者的生活过程当中。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使企业具有调整内部科层结构和雇佣方式的内在动力;从社会总体劳动过程来看,“大数据”是物理世界中人类大规模劳动分工协作和劳动交换体系在数字孪生世界里的映射。数字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劳动者的分化,对劳动者素质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国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过程;劳动资料

**【作者简介】**胡莹(1980- ),女,湖南澧县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原文出处】**《社会主义研究》(武汉),2021.4.41~48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过程研究”(20&ZD056)。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互动方式,正在改变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方式。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从两大视角展开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一是从《资本论》及其手稿出发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进行解读,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践进行分析。近年来,平台零工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学科方法来看,集中在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对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进行重点分析,对其他职业人群的分析相对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针对企业内部劳动过

程的研究较多,对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后者恰恰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通过分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协作劳动向机器大工业劳动的转变,阐释了工业经济时代初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特点。当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时,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马克思如何对劳动过程进行界定,他研究劳动过程的基本思路是怎样的?第二,根据这一研究思路,如何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作出分析?第三,通过这一分析,能否概括出经济时代作用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机制?

### 一、劳动过程界定

“劳动过程”这一范畴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篇幅来考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定形式,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劳动是如何从简单协作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劳动的,以及参与生产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特定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两大角度对劳动过程进行了研究,前者侧重于劳动的技术形式,后者侧重于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

#### (一)劳动过程的一般性:劳动的技术形式

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sup>①</sup>。马克思首先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对劳动进行了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sup>②</sup>马克思区分了两种“自然”,一种是人自身的自然力,一种是人身外的自然。人自身的自然力强调的是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人,其对立方面是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是真正与“自然”相对立的“人”,体现着劳动的目的。

马克思区分了两类劳动对象,一类是“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sup>③</sup>,另一类是“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sup>④</sup>。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sup>⑤</sup>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劳动资料在人类劳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写道:“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sup>⑥</sup>如果从结果的角度、产品的角度对整个劳动过程加以考察,那么在劳动过程的三要

素中,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它的规定也就改变。”<sup>⑦</sup>

在界定劳动过程三要素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进行了阐释:“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sup>⑧</sup>。就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而言,它指的是作为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劳动过程,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社会的生产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劳动过程的一般性”理解为劳动的技术形式。

#### (二)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性: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

当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劳动过程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却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sup>⑨</sup>首先,从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角度来看,“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sup>⑩</sup>。这意味着资本家要对劳动者进行监督和控制,确保原料不浪费,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其次,从产品分配的角度来看,“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sup>⑪</sup>。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消费其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过程。因此,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性体现在“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sup>⑫</sup>。

马克思从劳动的独立性和社会依赖性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阐释劳动过程中一般意义上的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技术越是发展,分工越是发展,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就越是独立的和单方面的,但与此同时劳动者对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大。“个人生产的独立性,就由在分工上取得相应表现的社会依赖性得到补充。”<sup>⑮</sup>技术越是发展,“社会需要的体系越是成为多方面的,个人的生产越是成为单方面的,也就是说,社会分工越是发展,那么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生产或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性质就越有决定意义”<sup>⑯</sup>。这是因为,劳动者并不把自己生产的产品当作自身直接的生存源泉,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经过一定的社会过程,经过一定的形态变化才能成为对他本人有用的产品。因此,劳动者已经是在某种联系之中、在某种交往关系之中进行生产。这些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是经过某种历史过程才形成的,对他本人来说却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马克思指出:“这种个人的孤立化,他在生产内部在单个点上独立化,是受分工制约的,而分工又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这些经济条件全面地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和他自己的存在方式。”<sup>⑰</sup>

### (三)劳动的技术形式对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影响

马克思指出:“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sup>⑱</sup>由此可见,劳动资料是连接劳动的技术形式和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中介。技术的发展突出地体现在劳动资料的革新上,而劳动资料的革新带来劳动分工的变化,对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马克思通过对分工的阐释来论证“我只有为社会生产才是为自己生产,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又在另一个领域中为我劳动”<sup>⑲</sup>这一观点。交换的主体在生产中从属于社会劳动的分工。因为相互交换的商品无非是物化在各种使用价值中的劳动,只是分工的物质存在,只是不同质的、适合不同体系需要的劳动的物化。当个体劳动者生产商品时,这个商品并不是劳动者本身所需要的,对

劳动者来说并不是直接的生活资料,而只是交换价值。因此,只有当它在货币上取得一般社会产品的形式,它才能成为劳动者个人的生活资料。劳动者用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来证实他的私人劳动是社会劳动。“他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总体中的一个特殊,是作为一个特殊部分补充这一总体的一个分支。”<sup>⑳</sup>个体劳动通过作为劳动总体的一部分而与社会发生联系。马克思从技术推动了分工和交换发展、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又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分析了劳动的技术形式对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塑造和限制,在社会层面——而不仅仅局限在个别工场内部——对考察劳动过程的两大维度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说明,从而描绘出一幅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劳动过程的宏大画卷。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思路理解为生产力层面上的劳动过程决定了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劳动过程。

技术条件和社会关系共同塑造了某一特定时期的劳动过程,由此也决定了对劳动过程进行考察的两个重要维度——劳动的技术形式和劳动的组织形式。这两个考察维度各有侧重,但彼此相互影响、紧密联系。当我们对劳动过程的实践进行考察时,从其组成部分来看,劳动过程又可以分为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过程,是由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共同构成的。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层次对我国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在对每个层次的考察中,主要遵循马克思分析劳动过程的思路,从劳动的技术形式、劳动的组织形式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来展开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劳动过程的具体分析。

## 二、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对象性形式。”<sup>㉑</sup>对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考察,就是对劳动从运动形式转化为对象性形式的微观过程的考察。数字技术对企业劳动过程的介入使得劳动过程开始无缝镶嵌和全面浸润在人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使企业具有调整内部科层结构和雇佣方式的内在动力。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企业与劳

动者之间的密切程度有所加深。

### (一)劳动的技术形式:劳动控制与劳动时空

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sup>①</sup>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实现各种劳动资料的最佳结合所必需的信息传递系统可以被称作“神经系统”<sup>②</sup>。为了实现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的充分有用性,劳动过程中的管理问题出现,而技术手段对管理方式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控制仍然是我国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主要内容,而劳动资料体系中数字化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和“神经系统”则为劳动控制提供了新的手段。

劳动控制的方式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而变得多样化和智能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效率。传统的人工监督已被大数据、智能监控的全天不间断的高强度、自动化监督控制所取代。以美团骑手为例,2019年骑手日均配送里程有所增长,相比2018年增长约5.5%。日均配送里程大于50公里的骑手比从2018年的13.8%增至2019年的18.2%。<sup>③</sup>外卖骑手的行动轨迹受到平台和顾客的双重监督,通过运用机器学习、运筹优化、调度仿真等技术研发智能调度系统,即时配送平台以效率最高的方式分派和优化订单,提升了配送效率,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在高峰期,“美团超脑”每小时要支持29亿次的路径规划算法,平均每0.55毫秒规划1次路线。<sup>④</sup>

数字化的“神经系统”能够实现对劳动过程的远程实时监控,劳动者便可以分散在不同的空间而不是固定在统一的场所。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时空的自主选择上所体现出的灵活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把劳动当作一种自由自愿的活动。调查显示,64%的骑手对时间灵活最为看重,在诸多因素中排名最高。从时间分布来看,平均每天配送时间低于4小时的骑手占比达到58.8%,近六成骑手工作自由。<sup>⑤</sup>但是,当劳动的时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选择的时候,当劳动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时间限制的

时候,以效率提升和盈利增长为目标“赶工游戏”也使得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的介入使得工作入侵了闲暇,劳动过程开始无缝镶嵌和全面浸润在人们的生活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时空选择上的灵活性实质上使得劳动的强度增加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劳动者的思考和经验,缩小了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差异,劳动过程中的个人技术性有所降低。

### (二)劳动的企业组织形式:科层结构与雇佣方式

为了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协作网络化、产品服务个性化、市场响应及时化等要求,企业组织形态需要从刚性科层转变为柔性液态,需要从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sup>⑥</sup>劳动资料的数字化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协作,横跨多个领域的数字技术要求将多种技能的工人组成协作团队,扁平化、散点式、网络化的管理层级通过改善工人协作团队的活动,既有利于促进劳动过程的效率提升,也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能够更及时地得到处理。

由于数字革命降低了沟通的时空限制,以长期雇佣为主导的雇佣方式受到挑战,各种具有非正式性、临时性或非全日制特征的不稳定雇佣方式开始不断出现,并且开始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稳定的劳动者队伍的数字知识同质性有助于实现劳动协作,因此企业往往对核心员工采用内部化的长期雇佣,以避免信息外泄。由此,在企业内部,长期雇佣的员工和以不稳定方式雇佣的员工之间的差别也日益扩大,从而产生了两类群体雇佣身份的差别。这种身份的分化常常会使以不稳定方式雇佣的员工产生对于企业制度不公平的感知,不同雇佣身份的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也提高了,这些冲突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组织的效率。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和谐是巩固和增强人民参与社会生产愿望的基础,有利

于提升人民的获得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政府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间接管理者。很多国有企业也改变了原有的以长期雇佣方式为主的模式,开始使用各种短期雇佣方式,尤其是劳务派遣这一形式。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嵌入性,不仅嵌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且还嵌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劳动治理模式。<sup>④</sup>在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中,雇主和劳动者是劳动关系的两大主体,劳资矛盾时有发生。数字技术将在计量劳动成果和提升劳动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便在弥合劳资矛盾的基础上提升企业效益。但是,疯狂的数据系统大举入侵着雇员们的整个劳动过程,甚至连如厕的时长都要被数据系统记录下来。企业劳动争议主要发生在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方面,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实现劳资合作。企业、工会和政府是劳动关系的直接相关方。建立健全的三方协商机制对于我国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由于我国部分地方工会的代表性不足、部分地方政府的资本偏向等原因,三方协商机制的效果并未完全体现出来。

(三)劳动的技术形式对劳动的组织形式的影响:  
企业的“技术—经营”模式与劳动关系

技术与企业经营的发展一直是协同演化的。在数字技术条件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特征、经营理念、技术诉求、技术开放性和技术交付形态等与以往相比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企业面临的是更加个性化、碎片化的市场需求,经营理念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消费者为中心,技术的核心诉求从提升效率到推动创新,技术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技术交付形态从解决方案走向运营方案。<sup>⑤</sup>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业务数据化过程,主要经历了传统软件安装期和消费者在线化两个阶段。伴随着企业传统IT基础设施云端化、移动化,企业以消费者为核心建立起智能运营和决策体系。

马克思生活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经济时代初期,使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得以复

兴的布雷弗曼生活在20世纪的工业经济时代。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里,企业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布雷弗曼生活的年代,企业关注的问题是技术如何支撑和提高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效率。劳动控制和管理效率,是工业经济时代企业劳动过程的关键词。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提升效率转向了如何支撑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业务和管理复杂性的上升带来的结果,就是倒逼和推动了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变革。

在企业组织进行的液态化变革中,数字信息技术被引入以重塑企业结构形态、管理机制、运行方式。劳动者不再是被动接受指令的执行者,而是主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创客或动态合伙人。劳动者借助新技术对知识和信息的把握更加精准,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彰显。数字技术扩大了企业劳动过程的弹性范围,解决了以前存在的协作问题和信息问题,企业能够进一步对市场作出细分,产品也更加具有针对性。此外,为了增加产出,企业借助于数字化经营管理体系建立起跨功能的研发团队,降低了传统的工程师、制造和市场营销等工作的边界。部门化特征的弱化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为了完成弹性的工作、对市场作出快速反应,劳动者的工作认定更为宽泛且趋于完整,业务责任被授权给更低层级的管理者、监督者以及工作团队。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密切程度有所加深。

### 三、社会总体劳动过程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经济形态,其核心是以人工智能、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进步,造成了社会化、规模化的劳动分工、协作和交换体系。“大数据”便是物理世界中人类大规模劳动分工协作和劳动交换体系在数字孪生世界里的映射。在新就业形态和劳动分工体系的作用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劳动者的分化和数字鸿沟。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以及他自己的存在方式,推动了劳动过程的进一步社会化,加深了劳动

者对社会的依赖性。

### (一)劳动的技术形式:新业态与劳动力市场

人们担心以数字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会引发大规模失业。数字经济必将淘汰一批旧岗位,创造一批新岗位。有研究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岗位的创造速度快于旧岗位的消失速度。在岗位创造方面,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总就业规模为14952万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总就业规模为16009万人。在岗位消失方面,2017年数字经济导致12952万个岗位消失,占当年总就业的16.7%。2018年消失的岗位数提高到13270万个,占到当年就业总量的17.1%。岗位创造和岗位消失的差额,即净增就业,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2000万人和2739万人。<sup>⑧</sup>数字化所导致的直接劳动过程的简单化降低了劳动者的就业门槛,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又增加了对高技能、高智能劳动力的需求。数字经济融合了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信息,在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克服了传统市场经济在配置劳动力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完全问题,有效扩大了劳动力配置的空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就业所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疫情期间,基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7800万人。平台企业员工数约623万人,同比增长约4.2%。<sup>⑨</sup>可以预测,共享经济中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会成为我国现有劳动关系中的重要形式。由于共享经济灵活用工、弹性就业的特点,兼职就业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就业形式。滴滴平台上的兼职司机大约占到九成,78.9%的兼职司机每天在线时间少于5小时;美团平台上52%的骑手每天工作4小时以下;爱彼迎平台上近九成的中国房东是兼职。<sup>⑩</sup>65.3%的美团骑手的从业状态为“骑手是唯一的一份工作”;25.9%的骑手为“有正式工作,兼职做骑手”;8.8%的骑手为“同时做几份灵活就业工作,骑手是其中之一”。<sup>⑪</sup>共享经济主要是以无形的数字平台而不是有形的企业组织

作为中心。平台企业将自身定位为中介机构的角色,个体劳动者获得了极大的工作灵活性。但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劳动关系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

### (二)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劳动协作与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社会化

原本属于私有财产领域的资产及服务,伴随着数字化进程实现了消费竞争性的降低。这一功能的实现来自数字经济对所有权的弱化和对使用权的强化。在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模式的作用下,原本排他性较高的资产及服务正在逐步向低排他性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正在逐步扩大公共财产和准公共财产领域的比例。云端已经呈现出某种社会公共财产的属性,公有制将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平台+小前端”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分工协作模式。聚合模式是“平台的平台”,这个平台往往整合了众多其他平台的资源,用户可以通过一个入口获得多家平台提供的服务,一些超级平台还将不同种类的服务整合到其平台上。例如,微信第三方服务中接入了滴滴出行、美团等,支付宝生活服务中接入了哈啰出行、高德打车、饿了么外卖等。聚合模式和产能共享在实现生产方式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平台成本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分摊,产品越来越发展成为公共产品,这就是网络效应。

就平台企业而言,数据是一种基础性的生产要素。数据在被单独使用时,往往价值并不大,其所有者通常会在一对一交易时无偿让渡数据的所有权。然而,一旦海量的数据被平台公司汇聚成大数据时,量的积累会导致质的变化,此时的数据就会变成一个价值无比巨大的生产工具。从“数据”到“大数据”,表现出劳动分工、劳动协作和劳动交换的社会聚合效应。每个市场微观主体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各具体环节的单一数据聚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大数据,体现出马克思所说的“我只有为社会生产才是为自己生产,而社会的每个成员又在另一个领域中为我劳动”<sup>⑫</sup>这一论点。个体劳动通过作为劳动总体的一部分而与社会发生联系。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便是劳动的分工、协作和交换在社会总体层面

呈现出来的一幅生动画卷。

与单个工场(企业)内部相比,马克思更注重从社会总体层面、从全社会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层面对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他写道:“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sup>⑧</sup>在数字经济时代,个体生产的独立性愈益由分工上取得相应表现的社会依赖性来补充:劳动分工越是精细化,劳动协作就越是社会化的,而大数据就是将精细化的个体劳动与社会化的劳动协作紧密连接起来的一张数字网。物理世界与数字孪生世界相互映射、实时交互、高效协同。大数据就是物理世界中人类大规模劳动分工协作和劳动交换体系在数字孪生世界里的映射,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相互关联”。

### (三)劳动的技术形式对劳动的组织形式的影响: 社会分化与劳动保障

平台的中介逻辑、网络效应和垄断趋势对建立在之上的劳动关系进行了改造,使得数字平台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社会权力的一种新力量。劳动过程中数字技术深度研发和普遍运用的分离也加速了劳动者内部的分化。数字技术的深度研发使得掌握了具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者成为劳动过程数字化的受益者,而受到超视距数字化监控、作为数字指令的简单执行者的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则容易被忽略。

在传统的长期雇佣体制中,劳动者都有着较为完善的薪酬上涨机制,同时也能获得更稳定的社会保障。随着非正式性、临时性或非全日制特征的不稳定雇佣方式对原有的长期雇佣方式的替代,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面对就业的不稳定,这不仅对劳动者的收入产生了影响,也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来予以保护。数字平台上的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之间大多是劳务合作关系或自我雇佣形式,与传统的法定劳动关系性质不同,而且普遍存在多平台同时就业的情况,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系的参

保条件。如何界定政府、平台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等各方主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权责关系,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群体成为非典型雇佣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平台零工劳动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大都通过非正式性、临时性或非全日制特征的不稳定雇佣方式从事劳动条件和待遇较差的工作。2018年,77%的美团外卖骑手来自农村。<sup>⑨</sup>数字平台依靠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用工机制,有利于打破制度分割、构建一个基于平台的劳动力市场。平台获得了用工的灵活性,以这种方式促进了我国劳动者的就业,是雇佣外部化的进一步体现,劳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不稳定。

数字化大背景下隐藏着的“数字鸿沟”体现了社会主体间的不平等。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推动数字机遇的平等是我国跨越“数字鸿沟”的主要手段。马克思指出:“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sup>⑩</sup>覆盖面更加宽泛的工作要求劳动者拥有基本的数字素养,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培养劳动者基础性的数字知识、提升劳动者素质是数字经济时代弥合社会分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数据共享能打破少数人对数据产品的独占。

### 四、结语:经济时代作用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sup>⑪</sup>。劳动资料是用来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依据,我们对经济时代作用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机制的分析应该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技术进步通过改变劳动资料带来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会与作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具体体现在二者的连结点即劳动过程之中。数字经济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变企业的“技术—经营”模式而对企业的科层结构、雇佣方式和劳动关系提出

了新的要求,通过改变社会总体劳动的分工和协作方式而影响了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资料的数字化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改变一方面极大地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关系产生影响。

马克思指出:“基本的前提是流通的主体生产交换价值,即直接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社会规定性的产品,也就是在一定历史形态的分工下生产这些产品,而这一基本前提又包含着大量其他的前提,它们既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本性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些使个人已成为社会的个人,成为由社会规定的个人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产生的。”<sup>①</sup>劳动者在某种联系中进行生产,在只有经过某种历史过程才形成的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中进行生产,而这些条件和关系对他本人来说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这种“联系”“条件”和“自然的必然性”指的就是劳动过程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当前,在我国劳动过程中,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要着力塑造数字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使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手段。运用数字平台与云端的共享共有为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开辟新道路,促进就业,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数字经济更好地造福劳动者。

####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7-208、209、209、209、

210、213、215、216、216、216-217页。

⑬⑭⑮⑯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353、352、351、354页。

⑱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21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㉑韩文龙、刘璐:《数字劳动过程及其四种表现形式》,载于《财经科学》2020年第1期。

㉒㉓㉔《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中国外卖产业发展报告》,美团研究院网站(<https://mri.meituan.com/research/home>。)

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3页。

㉖参见贾文娟:《选择性放任:车间政治与国有企业劳动治理逻辑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㉗安筱鹏、宋斐:《转型之路:从数字化到数智化》,阿里研究院网站(<http://www.pre.aliresearch.com/Blog/Article/detail/id/21960.html>。)

㉘赵文:《数字经济创造就业多,还是减少就业多?》,载于《网络传播》2020年第5期。

㉙⑩《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0》,国家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sic.gov.cn/News/568/10429.htm>。)

⑪《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美团研究院网站(<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home>。)

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358页。

⑭《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美团研究院网站(<https://about.meituan.com/research/home>。)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